

# 王安石：独抗时流，立于浊流

# 对称之美



徐迅雷

名高一世，学贯千载；变法一时，争讼千年。2021年12月18日，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。

宁波鄞县(今鄞州区)是王安石早期主政的地方，是他变法思想的策源地。东钱湖畔有王安石纪念馆，“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”个性化邮票在此首发。同时通过拍摄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《王安石》、出版《王安石县政治研究丛书》等，深度发掘“王安石与鄞州”关系，进一步推进宋韵文化建设。

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不仅有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“春风自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等脍炙人口的诗句，还兼通儒释道三家，独自构筑起被后世称为“王学”的学问体系。苏轼高度评价王安石：“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”更重要的是，王安石以“王安石变法”名世。变法尽管最终失败了，但对北宋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彼时，大宋王朝危机重重，年轻的宋神宗刚当上皇帝，想着要革除弊政，重振国威，需要一个“总工程师”。有同样理念而且才华横溢的王安石，登上了变法舞台——因缘际会，舍我其谁。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心，兼顾军事与科举改革等。根据《易中天中华史·王安石变法》一书中的梳理，变法主要时间线是：

1069年(熙宁二年)，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开始厉行改革，史称“熙宁变法”，推行均输法和青苗法；1070年，行保甲法和免役法，司马光反对新法被贬，王安石任宰相；1071年，定科举法，苏轼被贬；1072年，行市易法、保马法、方田均税法；1074年，郑侠上《流民图》请废新法，王安石被贬；1075年，王安石官复原职；

## 随思录

毛海清

探春即贾探春，是小说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，金陵十二钗之一，荣国府贾政与奴婢出身的妾室赵姨娘所生的女儿，贾府通称三姑娘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描写探春的情节不多，却足够耀眼夺目。她是贾府中的佼佼者，浊水中的一股清流。多是昏庸政客、迂腐刻板，她却聪慧贤明、格局远大；亲娘愚昧粗俗、好惹是非，她却心志高雅、见之忘俗；亲弟弟猥琐窝囊、受人欺负，她却思维敏捷、行事果敢。

探春曾奉王夫人之命代凤姐理家，表现出卓越的管理能力。她从小人得志的种种迹象中，预感到贾府的岌岌可危。她是庶女逆袭的典范，硬是把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的效果，在《红楼梦》众多人物里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

探春是个人才，有据可查。《红楼梦》第55回，探春改革大观园，王熙凤曾评价贾府诸子时表示，正愁没个臂膀，但想来想去，只剩了三姑娘(探春)一个，心里、嘴里都也乐的，又是自家的人。

王熙凤作为管理者，的确有一技之长，泼辣能干，深得贾母赏识。可是，与探春相比较，也不占优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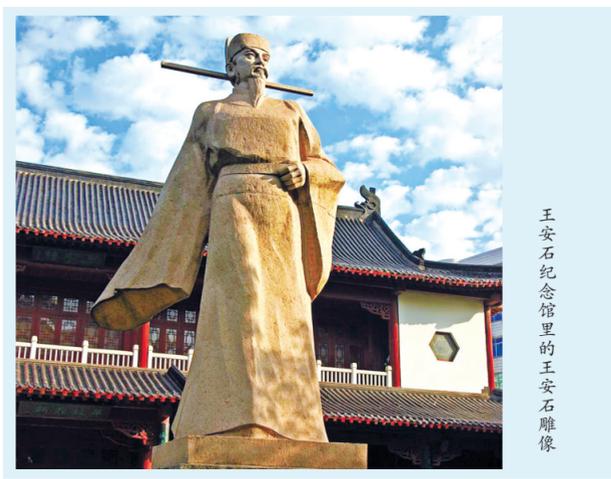
## 新知

王东京

“中国匠心大会”不久前在杭州召开，400多位参会代表皆来自国内制造业大牌民企。大会安排我作20分钟主题演讲，站在台上往下看，发现对面不少企业家满头银发，年龄应该在70岁以上。

是怎么回事?会间餐叙，我问坐在身边的华立集团汪力成董事长。他解释说，这些企业家当初创业时都很年轻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现在企业做大了，年龄也就大了，他们也想早点退下来安享晚年，可做制造业这一行太辛苦，赚钱又慢，儿孙们不肯接手。迫于无奈，还得自己接着干。

后来我又问过几位相熟的企业家，回答也大同小异。我有了一种担忧：中国是否会因为制造业后继无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?并非杞人忧天。国内学界前几年就在讨论资本



王安石纪念馆里的王安石雕像

1076年，王安石辞职，变法失败。

变法是觉醒，变法是探索，变法是试错。王安石可不想“独守千秋纸，上尘”。变法变革是必须的，不变是没有出路的。但怎么变、向什么方向变，则是关键。

王安石强化了政府对商业的干预，并试图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农业生产，增加财政收入，以实现国家利益与民生的“双赢”——以国家利益为主，以民生利益为辅。他的“理财”观，亦可看成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试图解决国家发展问题，将“礼制国家”变为“财政国家”。

变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，但并未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，甚至很大程度上演变成“与民争利”。更让王安石想不到的是，变法失败之后没多久，北宋就被金兵革了命。

## 二

千百年来，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文章汗牛充栋。易中天的书中，专门用一章《教训所在》，系统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，可谓着墨最多，用力最深，剖析最到位。其中《目的是个问题》一节直言：“王安石就是要喝尽一切可能，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……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。”

崇尚国家主义，自然会认为国

家利益至高无上，相信政府万能。“重天下”与“重民生”，真是有霄壤之别的；“富国强兵”和“强国富民”，两者毕竟差距很大。北宋时期，商品经济其实已经有了初步发展。可那时的王安石当然不知道700多年后英人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不知道政府“有形的手”之外，市场调节的“无形的手”一样重要，不知道《国富论》的本质是《民富论》，民富了国才能强，而不是倒过来。

易中天在书中说，“在他心目中，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，更高于个人利益。因此，即便其新法确有利和富民的考虑，那也是次要的。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，也是搭便车。首要目的，是富国强兵。既然如此，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。”

对比一下新中国的改革开放，发轫于农村基层，最终层层推进，取得伟大成就，恰恰是以赋予民众自由、解放生产力为主轴，以“人民不满意、拥不拥护”为准星。

王安石变法自上而下，本质上还是在“计划经济”和“计划政治”里头打转，最终口惠而实不至，其深化变革成了纸上谈兵，甚至适得其反。不能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“涸泽而渔”，就是剥夺民众，他也不想“放水养鱼”。

比如“青苗法”，在那个以农业

为主的时代，本意是希望在春秋两季农村青黄不接时，由政府提供普惠金融，为百姓提供贷款，以免遭受高利贷盘剥，然后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经济而多多获利，老百姓多少也可得到一些好处。没错，发放贷款，本来就是让农民扩大再生产。

然而，“政府万能”、非市场化的做法，落实下去，必然会演变成“运动化”的强制行为，到了下头很快变味，明令禁止的“强制摊派”结果在各地盛行，不能由着民众自愿。即使变革愿望很好，执行起来也会弊端不断。变法培养出来的官僚，上面要求他们的，是服从与执行，而非反思与纠偏。变法时期选拔、成长起来的官员，只习惯了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，做出“政绩”，同时不忘让自己获利，甚至有腐败官吏趁放款时，诱使获得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嬉戏玩乐，使其花光借款，欠下一屁股债。

## 三

变法变革，需要良好的环境，要“众志成城”，而不是“唱独角戏”或“演二人转”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人士，看到变法存在的问题，不良后果初现，于是成了“反对派”，群起而攻之，王安石两度罢相。司马光不是“砸缸”，而是“砸石”——砸硬王安石了。

避免变革的“变味”，甚至演变成一场灾难，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的。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说，一个民族要崛起，要改变三个方面：第一是人的改变；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；第三是器物经济的改变——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，如果颠倒，表面上看是走捷径，其实是走不通的……从秦肇帝制，到大清覆亡，中间这两千年，如何变革都是帝制内部的风暴，不是真正的“大变局”，政治制度的改变几无可能，所以器物经济变革的失败，其实是很好理解的。

论者有言：“变法虽然失败，但王安石没有失败。”王安石是独抗时流、立于浊流之人，其“矫世变俗”的抱负，“经世致用”的实践，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勇气，清廉自守的品格，寄情山林的本色，以及卓越的经学造诣、文学成就，令他与历代文人和政治人物拉开了距离，历经千年，“没有失败”。

## 世象管见

吴启钱

2021年12月2日，一个本是很普通的日子，但写成一组阿拉伯数字，20211202，很对称，就成了一个颇具意味的符号。

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，当天一大早，“对称日”冲上了热搜，很多情侣也在这一天登记结婚，希望“正反都是你，反正都是你”。

一个日子，一组数据，无论赋予其什么样的寓意，都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。“对称日”之所以成为网红，还有一个客观因素，即这组数据带给我们一种对称的形式之美，因而，2021年12月2日，也被称为“世界完全对称日”。

我们的人体，从外表上看，是完美对称。人体之外，自然界中，天与地、阴与阳、昼与夜、春夏与秋冬、山川与河流，都无不呈现出宏大的对称之美。

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。远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，楚国人伍举就说过：“夫美者，上下、内外、大小、远近皆无乖焉，故曰美。”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说过：“美的线形和其他一切美的形体，都必须有其对称形式。”

在这样一种审美观的指导下，中国的建筑美学，堪称典范。从皇城官苑，到普通民宅；从群体建筑的规划，到一户一室的布局；从亭台楼阁，到轩榭廊舫……处处都“中式对称”。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过，无论东方、西方，再没有一个民族如我们这般，对中轴线如此钟爱与恪守。实际上，时至今日，小到日常生活器具，大到建筑与城市布局，对称仍旧与我们如影随形。

对称的本质是平衡。进而给我们带来稳定、和谐和放松的体验，我们会感觉里里外外皆均衡妥帖。对称之美，不仅存在于静态物体上，也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，还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，即文明。

就国家政治层面来说，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称的，公权与私权是对称的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，官员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对称的，司法对善的褒扬和对恶的惩处是对称的，都会构成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状态，此为政治文明。政治文明的发展，使人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、合理，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突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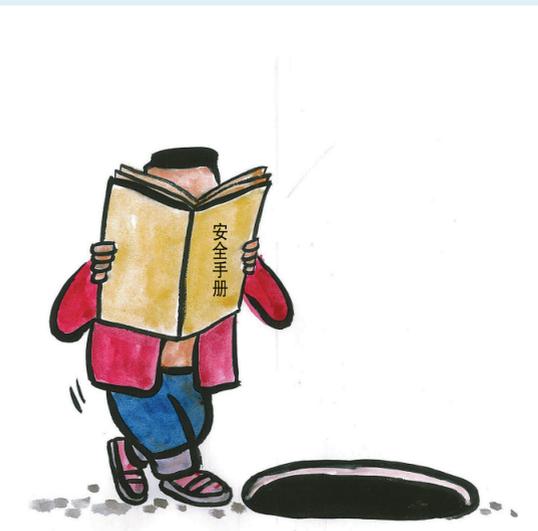
就个人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言与行不对称，口是心非，口蜜腹剑，说一套做一套，那就是不文明的、不道德的，让人产生强烈反感。

比如，有人把自家打扫得很干净，却把杂物堆放在楼道里；有人开着豪车，却往车外吐痰扔垃圾；有人视宠物为儿女，却让狗在小区里随地大小便；有人一身名牌，在公共场合却大声喧哗，飞扬跋扈；有人在台上高唱反腐，台下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受贿的机会；有人满口爱国，却将妻儿送出国，将钱存到瑞士银行……

这些人他们的行为，之所以是不文明的，就是因为表里不对称，责任与义务的不对称，对己与对人的不对称，虚假盛行，表里不一，“两面人”做派，往深里说，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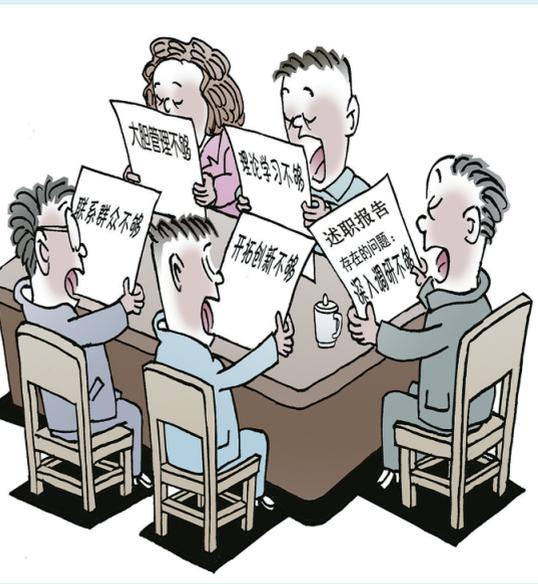
艺术上对称之美，美在平衡，美在大气，美在庄重，那么，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，对称之美，就应美在真实，美在稳健，美在和谐。这样的对称之美，才会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文明进步。

## 漫画角



## 安全学习

蓝波 绘



## “标配”问题

蒋跃新 绘

# 探春是个难得的人才

贵族小姐出身的王熙凤不识字，无疑是一大弱项。

凤姐在跟平儿谈及探春理家时，曾说：“她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不过是言语谨慎；她又比我知书识字，更厉害一层了。”王熙凤还算是有自知之明。不同的是，就办事方法而言，王熙凤是事务主义者，就事论事。探春则善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和处理问题，格局完全不一样。

更大的是“德”的差距。探春扇了刁奴一记耳光，让人感到爽快；王熙凤在清虚观打上了小道士一巴掌，却令人反感。实际上，王熙凤早已恶行累累、劣迹斑斑。如克扣丫鬟的工钱放高利贷牟取私利；弄权铁槛寺，三千两银子包揽诉讼，导致一对鸳鸯命赴阴曹；对于“情敌”尤二姐，更是痛下杀手；即便是被她利用了张华，也要在事后斩草除根。

真正能与探春一比的，应该是薛宝钗。薛宝钗有才、有貌，但心机重，城府深，擅长处理人际关系，人缘极好，就连小丫头们“亦多与宝钗玩笑”，这让孤傲的黛玉也嫉妒。

探春与薛宝钗比较，探春聪明，宝钗精明；探春会做事，宝钗会做人。但人缘好，未必心眼好，有可能

善于表演，自我伪装。薛宝钗一抓住机会，就以隐讳的语言贬低凤姐、挖苦黛玉。谁都不难看出，她贬低凤姐，是另有图谋。

薛宝钗为金钏儿的死安慰王夫人时，暴露了冷酷无情的心理；“宝钗扑蝶”的故事证实她虚伪奸险的一面。透过“计划经济”和“计划政治”里头打转，最终口惠而实不至，其深化变革成了纸上谈兵，甚至适得其反。不能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就是“涸泽而渔”，就是剥夺民众，他也不想“放水养鱼”。

治家理事，不仅要有与君子打交道的本领，也不能缺少应对小人的办法。探春理家不久，以吴新登的媳妇为主要代表的执事媳妇们，就开始挖坑设陷阱。某日，探春遇到了一件尴尬事：赵姨娘的兄弟，探春的亲舅舅赵国基死了，按贾府旧例，应该给二十两银子的安葬费。可吴新登的媳妇要按四十两的标准发放。老实的李纨被蒙了，探春敏锐地发现问题，经过一番周折，照例发二十两。这时，赵姨娘又来胡搅蛮缠，面对这个“坑女儿的娘”，探春晓之以理。就这样，探春挫败了吴新登媳妇等人的阴谋，顺势为自己立了威。这与后来掌握刁奴一样，对待小人，就要坚决痛击。

庶女探春具有帅才，也就是组

织管理能力。这在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”中，得到了充分体现，她的智慧和干练在这里显露无遗。

凤姐生病，探春等三人受命管家事。一上任，探春便干脆落地处理了舅舅舅安葬费之争，又免了贾环、贾兰、宝玉上学的月钱，还把每个姑娘每月的头油脂粉费二两银子免了，因为这两项支出都是重复的。她还提出“分区承包制”的大观园管理方案，把一个消费型的大观园，改造成生产型的种植园，增加了贾府的收入。她一登议事厅，几件事一过手，荣府的管事娘子们，便感到这三姑娘“精细处不让凤姐儿”。

海棠诗社是大观园里由探春发起成立的文学团体。按说写诗的水平，林黛玉、薛宝钗要高于探春，可创建诗社为何是探春提议?探春有组织能力，是一个“见之忘俗”的人，喜欢精巧雅致的生活。她创建诗社，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——改进大观园的文化环境，提升精神生活品质。

当然，探春再能干，也无法改变贾府没落的大趋势。大观园被抄检，探春敏锐地察觉到“将来还有抄没”。这点，秦可卿临死前曾托梦告诫，也只有探春意识到了。她的敏感和见解令人钦佩。

# 如何扭转资本“脱实向虚”的局面

“脱实向虚”问题，中央也高度重视，说明我们也在“产业空心化”的潜在风险。

资本“脱实向虚”的原因虽多，但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。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强调回归制造业，表明实体经济相对于商贸服务业已显得稀缺。既如此，资本为何还对虚拟经济情有独钟呢?难道供求规律已经失灵?

要弄清这个问题，还得回到马克思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对“实体经济”与“虚拟经济”有过精辟论述。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，若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膨胀，必形成经济泡沫，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。而要抑制虚拟资本膨胀，前提是全社会利润率要平均化(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)。利润平均化需满足两

个条件：部门间可以自由竞争；资本在不同部门能够自由流动。

现在看，中国的现实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。国内资本“脱实向虚”，的确是虚拟经济利润相对高所造成的结果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率为6.84%，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却高达16.27%。金融业利润率之所以比制造业利润率高，原因是政府对金融业牌照有严格管制，资本难以自由进入。也就是说，目前金融业利润中，有一部分是“行政租”。

问题就在这里：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财富(价值)，却参与财富(价值)分配。当财富(价值)一定时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则相互消长：虚拟经济的收益高，实体经济的收益就会低。从投资选择看，虚拟经

济收益越高，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。制造业后继乏人，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

要扭转资本“脱实向虚”的局面，必须标本兼治。治本的办法，当然是打破行政性经营垄断。可此举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眼前还得有治标的办法，可考虑在税收政策上再作调整，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减税力度。

2016年国家启动“营改增”试点，制造业适用税率为16%，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为11%，金融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为6%。2019年，制造业适用税率调减至13%；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减至10%。为支持实体经济，国家何不将制造业适用税率也减至10%? 来源：学习时报